

厦门市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 50 周年论文集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厦门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五十周年论文集**

主 编：黄坤胜 黄顺通
副 主 编：刘正英 陈耀荣
责任编辑：卢茂材 吴丽琼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孔永松(2)
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特色	黄志仁(13)
台湾与祖国大陆命运与共	
——重温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 50 年历史的启示	
.....	陈在正(22)
日据与抗战时期的台湾少数民族	陈国强(31)
日本的二战史观剖析	郭 梁(41)
世纪回眸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胜利 50	
周年.....	孙福生(50)
浅析抗战时期李友邦与当今李登辉之“台湾独立”的	
不同本质	黄坤胜(58)
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杰出贡献	曾昭铨(68)
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和特点	刘正英 黄顺通(77)
抗战时期我党关于联合英美战略的演变	何其颖(87)
✓厦门华侨与抗日战争	洪卜仁(95)
✓论日本之侵略厦门.....	方文图(101)
给中国抗战带来生机的全民族抗战.....	肖学信(107)
论国共两党在闽粤沿海的合作抗日.....	林天乙(116)
陈嘉庚先生的凛然民族气节.....	王 祉(126)
厦门在台湾同胞抗日战争中.....	林其泉(134)
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重大历史功绩.....	邱松庆(141)
同安抗日史事辑录.....	陈金城(149)

历史反思与时代课题

- 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比较的若干启示…… 黄顺力(157)
- 抗战时期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 吴 凌(164)
- 抗日县长胡邦宪…… 曾吉成(173)
- 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 郑剑顺(182)

野蛮性与虚弱性

——日寇侵犯金门厦门罪行及其本质的大暴露

- …… 苏明辉(187)
- 日伪夺取中国东北海关述论…… 连心豪(192)
- 论抗日游击战争…… 黄金镇(200)
- ✓ 浅论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周日升(208)
- 一支出色的儿童抗日宣传队

——厦门儿童救亡剧团 …… 刘正英 黄顺通(214)

从抗战时期解放区的科技事业看邓小平科学技术是

- 第一生产力的理论…… 李碧霞(221)
- 陈嘉庚与抗战时期福建政治革新…… 杨沐喜(227)
-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策略的

理论和实践…… 罗礼太(234)

延安精神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宝…… 邱志强(242)

日寇在中国沦陷区强迫种植鸦片的罪行…… 李桂英(250)

试论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社会基础…… 陈衍德(258)

陈嘉庚与福建抗战…… 叶 涛(268)

“七七事变”与台湾人…… 陈小冲(276)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为恢复在台湾行使主权的

努力 …… 贺东航(282)

赤子功勋 永垂青史

——读《陈嘉庚与华侨机工》…… 陈延杭(289)

抗战初期福建省统一战线的形成概况…… 姜 山(297)

日军破坏集美学村的罪行·····	陈少斌(302)
日本军阀侵华罪行铁证如山	
——且听《铁蹄下的厦门》悲歌·····	陈常煜(309)
抗战时期陈嘉庚爱国言行录·····	陈瑞仁(313)
一部爱国主义好教材	
——纪念抗日民族女英雄李林牺牲 55 周年 ···	陈水杨(321)
追记一段史实·····	李熙泰(327)
近五年抗日战争史研究文章篇目索引·····	郑雅真 郑剑顺(329)

编者的话

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的抗战,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打破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推动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具有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8 月 25 日,由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社科联、市历史学会联合召开厦门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共收到论文 44 篇,现将论文汇编成册,以飨读者。

1995 年 11 月

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孔永松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取得了近百年来反抗外国侵略的完全胜利,一洗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凌害欺压的奇耻大辱。值此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本文拟就国共合作的必然性,国共合作对取得抗战的胜利提高中国大国地位所起的作用及所实行的“一国两制”的合作方式与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前景作些探讨。

一、国共合作抗日是历史的必然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谋图独霸中国,从而使整个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间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怒潮以及国际上各种因素互相影响,经过极为复杂曲折的过程最终形成的。

众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疯狂推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大陆政策。随着本世纪 20 年代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其称霸世界的欲望更为膨胀,大造“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舆论,挑起各种事端,1931 年终于发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执政的国民党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在关外,还没有直接危及其生存。因此,蒋介石不但没有顺应历史的要求,组织全民族进行抗战,相反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蒋介石反复宣称:“攘外必先安

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他的第一个“责任”仍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根据这一反动国策,国民党当局在军事上对中共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将国共两党内战推向高潮,给日本侵略者以有隙可乘。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曾以各种方式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但这时期正是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着党中央,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反对国民党并列,甚至把推翻国民政府作为中心工作。如1932年1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只有全中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把政权拿在我们民众自己手里,我们才能真正的去举行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中国,把东三省完全收回。”并强调“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共虽然也提出过“统一战线”,但主要侧重于“下层统一战线”,没有考虑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

可以说1935年是国共双方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年。我们说共同抗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同时,既然是要搞合作,就不能一厢情愿,必须双方转变敌对政策。

国共两党关系的转变,不仅决定于中共政策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转变。因为,当时蒋介石政权控制着全国政治经济命脉,掌握几百万军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蒋介石不抗日,仍坚持反共内战,合作就无从谈起,正如毛泽东所说:“红军与蒋介石间能否成立协定,并不决定于中国苏维埃政府,而是决定于蒋介石是不是决心抗日”。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在国际上美、英与日本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了。因为,日本对华的侵略行径,严重威胁了英、美在华利益。促使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与亲日派的分化,亲英美派代表蒋介石们深深感到,日本的北进“就是要占领满蒙,并吞

中国，独霸东亚，作无止境的发展”，中日一战，势在难免。在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国民党营垒中的地方实力派与中间派势力对“攘外安内”的反动国策强烈不满，他们放弃反共主张，要求抗日。当时国内形势是“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而去”。如是，在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变化。对外着手准备抗战；对内寻求与共产党联合，朝着联共抗日的方向发展。1935年秋，蒋介石在平汉路沿线调集了10万军队，以作保卫河南的准备。11月，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蒋介石仍奢谈决不放弃“和平”外，还表示了“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的态度。20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会谈时强调：“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进一步表示：“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以上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已由原来的妥协退让“不抵抗主义”，逐步向实行抗战转化，这个转化是国共合作的前提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转变后，随之也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希望利用苏联牵制日本。苏联也想利用蒋的兵力拖住日本，以避免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抗战。1935年秋，当蒋介石得知苏支持其抗战的态度后，立即召驻苏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并派陈立夫与苏驻南京大使鲍戈莫洛夫会谈，改善同苏联关系。与此同时，蒋对中共的政策也开始转变，所谓“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蒋介石通过各种渠道如通过宋庆龄派牧师董健吾到陕北与中共联系；通过驻苏武官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取得联系，王明派潘汉年与陈果夫接触，蒋介石派陈立夫通过曾养甫找到中共地下党员谌小岑、吕振羽打通

与中共的联系。应该指出,这个时期(1935年秋至1936年夏)蒋介石的态度是:“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中国红军存在”。因此,国共双方虽有接触,但一时难于达成协议,只是为尔后谈判开辟了道路。

1935年也是中共政策大转变的一年。1月,红军在长征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这就为中共纠正“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创造了前提条件。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分析了法西斯上台的原因,总结了前一时期的“左”倾关门主义的教训,提出要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8月1日,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布孤立主义的“下层统战”时期的结束,不再把中间势力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应要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组织各抗日阶级党派的国防政府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联军。11月,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由苏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会议着重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并宣布将苏维埃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富农的政策。27日,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就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和一切可能的友军,向着“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攻击前进。这标志着共产党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出台。但这时期,要共产党人与双手沾满共产党与工农群众鲜血,而且仍然坚持“不能让红军存在”的蒋介石联合抗日,确是很困难的。此时中共的口号是“反蒋抗日”,并开始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一系列停战协定。同时派彭雪枫、薄一波等去

山西争取阎锡山抗战，阎打出“迎共抗日”的旗帜。统战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但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当头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蒋介石是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军的最高领导人，要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不但不能把他排除在外，相反地蒋介石是最关键的人物。尽管共产党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他，但这是严峻的事实。因此，1936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国苏维埃政府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坦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经过9个月的实践，至1936年5月5日，红军东征回师，使中共感到，如不放弃“反蒋”口号，停止内战只能是停留在纸上。因此，中共发表了“五五”回师通电，向国民党直接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意味着中共开始考虑放弃“反蒋抗日”的口号。8月，鉴于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日态度比在国民党“五大”时更为强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统一路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结束了“反蒋抗日”阶段，开始了“逼蒋抗日”新阶段。

10月，毛泽东同美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假如国共合作“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但此期间，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对中共又发动大规模的武力“进剿”，蒋并于11月20日亲飞西安“督剿”，导致发生“西安事变”。因此，在“西安事变”初期，中共主张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共产国际则力主释放蒋介石。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放弃了“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的主张，提出“保蒋安全”的建议。蒋在口头上也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变的枢纽。国共两党停止了军事的敌对行动，为国共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1937年2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前夕，向国民党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共产党表明，国共两党在合作抗日的前提下，取消两党对立状态，宣布拥护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苏区改为边区，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同时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独立领导自己的军队和边区，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即实行一个国家——中华民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建议。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建议，在大会宣言中，对内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对日则提出“蒙受损害超过忍耐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的原则。“卢沟桥事变”发生后，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经过尖锐斗争，双方都作了让步，最后达成了协议。9月22日，国民党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就这个宣言发表了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成为全民族的中流砥柱，其意义诚如毛泽东所说：“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二、国共合作两个战场互相配合最后 战胜敌人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国共两党实质性的合作是从军队开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已有了独立的军队和根据地政权，国共两党各自领导的军队联合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关于红军改编经多次协商，本着互让精神，双方同意：中国工农红军改名，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编入全国战斗序列，属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指挥,担负一定的作战任务。双方还商定,红军不参预友军中分割使用,而由共产党指挥集中使用,红军主要不是在正面单纯地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而是在敌人侧后方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即主要进行战略配合。于是,中国的抗战逐渐形成两个战场,即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过去对两个战场的作用,两岸学者是有失偏颇的,如一方指责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是“游而不击”“借抗战之名,发展自己势力之实”;另一方则抨击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溃千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可以说以上互相指责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是两个战场互相依存,互相支持,战略上互相配合,缺一不可。如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就是国共合作的结晶。在作战方针上,周恩来、叶剑英曾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议“津浦路南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驰骋辽阔的淮河流域,使这里的日军时刻感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进的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以上建议基本被采纳,周、叶并坦诚相告,中共中央已命令新四军张云逸支队协同桂系李品仙、廖磊集团军作战。在李宗仁将军指挥下,国民党官兵浴血奋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在敌后战场箝制了大量日伪军,与敌周旋于津浦路的东西南北。两个战场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终于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写下了国共两党合作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光辉篇章。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积极努力的,正面战场曾进行淞沪、忻口、台儿庄、徐州、武汉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打了许多硬仗、胜仗,付出了80多万的军队牺牲,牵制了2/3以上日本在华的侵略军事力量,打破了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同时也掩护和策应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展开。1937年9月以后,八路军3个师在雁北、五台、正太路南侧建立了敌后游击根据地,先后取得了平型关、雁门关、七亘村伏击战和夜袭阳

明堡机场的胜利，揭开了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的序幕。1938年2月以后，八路军在晋、察、冀、豫四省交界处进行战略展开。至1938年6月，八路军在华北创建了10个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在江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于是，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形成了互为依托的战略格局。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会战后，日军已无力继续战略进攻，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攻击，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政策也逐渐转为抗日反共并重，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这样，敌后战场日益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战略作用。但也要看到，国民党始终不敢打出“剿共”的旗号，也没有丢掉抗日的招牌，国民党仍有继续抗战的一面。1939年至1941年，正面战场组织了南昌、随枣、桂南、零宜、上高、晋南及长沙第一、二、三次会战。其中，随枣战役、第一次长沙战役、上高和第二次长沙战役打了胜仗。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式对日、德宣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2年春组建了中国远征军两次赴缅协助英、美盟军对日作战，取得克服缅北、滇西的重大胜利。1944年春至1945年1月，正面战场的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虽是溃败的局面，但1945年春的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桂柳反攻战却取得了胜利。从整体来说，正面战场仍然牵制了进攻敌后战场的日军，起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相持阶段，由于敌后战场取代了正面战场成为主战场的地位，共产党强化了敌后游击队，从山区发展到平原和河湖港汊，造成华北与华中两大游击集团互为呼应。1940年夏，日本侵略军对重庆、昆明狂轰滥炸，重庆大为恐慌，为了鼓励国民党军士气，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消灭敌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伪军18688人，破坏铁路474公里，沉重地打击了敌

人并对稳定蒋介石坚持抗战起了重大作用。在太平洋战争前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发动了第四次“治安肃正”作战，对敌后根据地轮番“扫荡”，敌后根据地处于极度困难状态。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十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到1942年终于度过了难关。1943年转入了恢复发展时期，1944年敌后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

国共合作抗日形成的两个战场有机地组成中国战场。至1944年侵华日军的大部队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孤立据点上，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1945年中国军队继续主动进攻敌军，8月9日对敌最后一战，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历史雄辩地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开辟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杀敌最多（日军伤亡总数160万人，在中国战场上伤亡130万人，占总数83.1%），伤亡最大（在整个大战中军队与平民伤亡总数是9,000万，其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约占总数的40%）。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也是国共合作，两个战场相辅相成赢得的胜利。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对打败日本侵略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历史地形成了战时的四大强国之一。

三、以史为鉴“一国两制”是 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最好方式

抗战胜利了，国共两党的“平行利益”——战胜日本侵略军获得了解决，但打败日本后在建什么国的问题上，两党阶级利益各“异”，主张是对立的，矛盾也就日益激化。由于国民党当局决心用武力消灭共产党，虽经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分裂打了内

战。结果是国民党事与愿违，丢了大陆，负隅台湾，造成两岸对峙的格局。

50年代国共两党关系是对立的，但对立中仍然存在“平行的利益”，“一个中国”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利益，双方都保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帝国主义制造的“台湾中立化”，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均遭海峡两岸同声批驳。60、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大变动，中苏争论，中美接近。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在《上海联合公报》中有一段十分巧妙的文字：“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这就基本否定了1950年杜鲁门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及由此衍生出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等谬论。国共双方尽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对外国势力所制造的“两个中国”等分裂活动，国共两党都进行过不懈的斗争，并且配合默契。

早在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提出“爱国一家”、“和为贵”为第三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80年代初，叶剑英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接着，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共产党倡导下，逼于形势的发展，国民党也调整了对中共的政策，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制定了“现阶段大陆政策案”，1990年宣布结束“动员戡乱体制”。海峡两岸关系由对峙趋向缓和。这样，国共两党的矛盾已不是建什么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是采取什么方式统一的问题。矛盾也由对抗性向非对抗性转化，第三次国共合作已呼之欲出。

从历史经验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共两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不同的“平行利益”，如：为了共同打倒军阀，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了共同抗日有第二次国共合作，今天为了统一祖国，势必会有第三次国

共合作。国共两党除了有“平行利益”外，还有各自的阶级利益和政治信仰，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这样，合作的方式就很重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由于中共处于幼年时期，人数和影响都有限，只能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地盘、军队、政权。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控制中央政权，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合作的形式是以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导的前提下实现的。但中共始终坚持“保持红军的独立性”，特区政府行政人员由普选产生，南京政府任命。实际上保证了特区政府的完整性和中共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谁也吃不掉谁，是“一国两制”的方式。

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根据国民党的处境，提出两党平等谈判，实行“一国两制”，是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最好方式。现实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去台后，经过改革，演化成了地方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掌握了大陆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性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因此，“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具有高度的自治权，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十亿人民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一国两制”长期不变，至少 50 年不变，谁也不吃掉谁。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祖国大业，与实现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国共两党的领导人以及全国各族同胞，都应促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这也是重温抗日战争胜利的真意之所在。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统一、繁荣、昌盛的祖国而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系）